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3)06-0073-05

生态农耕的多元收益考察

吕程平

(中国人民大学 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通过对生态农耕户的收益考察发现,南方地区的生态种植户收入较之前实现了倍增:对于经营多年的有成熟城市消费者网络的生态农耕户,其收入结构实现了以生态农业为基础的多样化;对于首年使用生态农耕的农户,在城市环保公益组织的支持下,当年就实现了收支平衡且有盈余。生态农耕的发展,实现了农户的价值回归与身份捡拾,有利于人力资本的再生,实现了“益农”式的增长,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促进了农村社区生产方式的转变,实现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高度统一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生态农耕;多元收益;农民增收

[中图分类号]F320;X24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3.06.014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历史悠久,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对在国人中逐步形成和谐共生的理念、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为深入了解生态农耕的收益情况,为我国生态农业的发展研究提供一些有借鉴意义的资料,笔者对生态农耕社区的90个生态农耕农户进行了问卷调查,对山西永济生态联合社、四川郫县生态农户合作组、归朴有机农园的主要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并利用依托广西土生良品的广西都安6家生态农户在实施生态农耕前后的生产数据,对农户经济收益进行了对比。基于研究初始设计的需要,本研究除了论述农户在实施生态农耕后的收入变化外,还尝试从农户的自我态度考察其持续的可行能力的变化;同时,生态农耕对农村社区环境、综合健康水平的影响也被纳入了考察视野。本研究获得了世界绿色和平组织的资助,得到了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授权使用相关研究数据。

一、调查案例

本文涉及的农户生态农耕案例,在地域上跨越中国南北不同气候带,在生产上包括了以小农户为主体相对独立运作的生态农耕案例、以农村社区农

户合作组织为载体进行较大规模运作的生态农耕案例,以及由当地政府提供相应支持的城市周边市民农园的案例。这些案例在具体形态上虽不尽相同,但在以下3个方面形成了共同的特点,从而均归于本文所讨论的生态农耕范畴:一是在对工业化农业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从人与土地的关系出发,构建符合生态文明理念的农耕生产体系;二是重视并构造生产过程、结果及农产品交易的正外部性,在实施中有意识地从劳动者自身、社区、环境乃至社会角度看待农耕过程的综合收益;三是在生产技艺上,传统的农耕手艺与现代的技术手段并用,尝试回归与超越传统农耕,旨在创造生产过程与自然的融洽关系。

(1)归朴有机农园是由返乡大学生王宁在河南登封进行的生态农耕实践园。它以小农合作的方式生产,采取与郑州的消费者组织对接的模式销售农产品。目前该农园处于社区支持农业的实验和初创阶段,以小成本为基础,按社会企业的模式运作,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四川郫县安龙村以高家为核心的生态农耕农户形成合作组,在当地环保组织和消费者的支持下,2007年8月开始进行生态农耕产品配送。截至2009年3月,消费者已经由最初的几户发展到现在

[收稿日期] 2013-10-15

[作者简介] 吕程平(1981—),男,北京市怀柔区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100多户,固定消费者60多户。

(3)基于广西土生良品饭店产品配送的农户生态农耕。广西柳州爱农会所属的南宁市土生良品饭店,所有食材均不使用化肥农药,并且大部分食材都为当地土生物种,如水稻为当地自留水稻即当地以往种植的品种,而非杂交水稻,鸡为当地的土鸡。他们提倡健康生态食品,反对使用化肥农药和转基因食品,也通过这种模式尝试社区支持农户(CSA)的理念,帮助农户。目前,土生良品饭店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每月营业额高达30万元以上。

(4)山西永济的生态联合社,是以当地已开展十余年的农户多方位合作组织为依托建立起来的。2001年2月,寨子村小学老师郑冰在市妇联的启发下成立了“永济市妇女科技服务中心”。经过多年发展,蒲韩乡村社区确定围绕社区公共需求和专业经济合作两条主线提供服务,根据社区内现有资源和实际状况,多个独立项目实施互助探索,其中就包括本研究考察的农户生态联合社。

二、实施生态农耕后农户经济收入评价

1. 广西都安生态农耕农户的收益变化

广西都安生态农耕实践是与广西爱农会合作的,爱农会是一个旨在促进城乡互信互助的民间非营利机构。都安的生态耕作农户在采用有机耕作方法和当地土生稻谷品种旺稻后,产量虽然下降20%~50%左右,但由于完全拒绝农药的使用、采用自留种以及改用农家肥(未计入成本),参与调查的农户平均总成本下降近80%;更为重要的是,依靠爱农会较为成熟的销售模式和经营理念,有机稻谷的销售价格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比之前提升了2~3倍,收益平均增长率达到154.2%。总体来看,采用有机耕作的农户借助结构化的种植技术—销售渠道—品牌推广构建的生产运营模式,收益率提高近80%,甚至有很多农户实现了收入倍增。

以上只是水稻本身带来的收益变化,并未加入稻鸭养殖的收益。分难到土地上,平均每亩销售鸭子纯收入为800元左右。农牧结合后,每亩全年纯收入达到2670.8元,相比于采用生态种植模式前每亩收益的1040.8元,增加了1倍多。

2. 归朴有机农园的成本分析

对于从事生态农耕的农户,资金、经验和消费者网络等均相对缺乏的初始阶段无疑是最艰难的。河

南登封的归朴有机农园是从事生态农耕初期的典型案例。

从归朴有机农园2012年2~10月的成本构成来看,劳动力投入是最大的成本,占到总成本的40%左右。蔬菜种植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费时费工,从种到收都需要投入很多人力,所以发给农友的劳动补贴是18050元,平均每月为2005.5元,平均到4个农友是每个人500多元。之所以如此低是因为登封山区的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每个农友一般每个月会参与农园20天左右的劳动。参加农园劳动的农友一般还耕种有自己的土地,由于空间上距离很近,他们还可以抽出时间管理自己的土地和处理其他杂事,即使工资较低他们也可以接受,与雇佣农场相比,归朴有机农园有一定优势。邻近乡镇的几个大农场因采用雇佣方式都处于亏损状态。

同时,归朴有机农园的王宁还请了自己的家人帮忙。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解释,这种家庭内部“雇佣”要支付的是农场的平均收入,而非大农场中要支付的边际产出。这种家庭内部劳动力的投入无疑降低了生产成本。对于参与到有机耕作中的农户,其劳动力投入相较于企业化运作农场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前者的成员收益是按照农户平均收益计算,即 $W = Q_A / L_A$ 。式中, W 为参与生态农耕之农户的收益, Q_A 为总产量, L_A 为劳动力总投入。

排在第2位的支出是配送费用,占到总成本的20%左右。因为农场承担配送到小区的费用,所以这个费用比较高,其他生产资料、种子、生活费用等都已经降到了最低。这样除去成本,第一年运作社区支持农业即可达到收支平衡并略有盈余。这就是做社区支持农业最大的好处,农场前期投入很少,降低了资金压力,可以利用消费者预付的蔬菜款购买生产资料等,而且消费者已经把1年的蔬菜订购下来,无需考虑市场销售问题,可以安心地投入生产。

应该指出的是,通讯费、网络费、交通费、宣传费用大多是用于城市消费者的组织费用,尽管有郑州本地环保公益组织承担了部分先期组织成本,但农场首年的消费者组织经费还是占到了总成本的20%~30%。

此次调研虽没能得到归朴有机农园收益的具体结构,但据王宁介绍,归朴有机农园在实施有机农业的第1年即达到了收支平衡且略有盈余。

3. 生态农耕与农户增收

“比外出打工要好”,这是调查过程中有机农户的普遍感受。王宁这样评价村子里其他人的打工生

活:“农民就像候鸟一样在这三个时候返回家乡,其他时候多在外面。”之所以如此,就在于目前农业的收益太低,农民单纯依靠农业生产的收入不足以支撑今天的生活、教育和医疗费用。该村每年都会有十余名学生考入大学,很多大学的学费加生活费一年都要上万元,而他们的家庭依靠五六亩土地一年只有几千元的收入。杜鹰^[1]认为,在农业领域,从需求的角度看,在1980年代中期城乡温饱问题解决后,农产品的供求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主要农产品的收入弹性下降,农业增产与农民增收之间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而从供给角度来看,随着中国农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农业成本(特别是物耗)呈加速上升的趋势,近年来农业净产值平均每年下降0.5个百分点。其次,在价格形成机制上,尽管中国农业资源短缺,农产品价格上升是必然的趋势,然而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外部竞争的引入,国际市场的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势必产生抑制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从调整农户农耕收益结构、建立一体化的商业模式出发,生态农耕必将为广大小农户提供另一条参与市场竞争的途径。

生态农耕所带来的农户经济收益结构的变化,除了包容性定价机制和商业化运作模式之外,还需要综合考量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先期成本的第三方支付。依赖农产品直销方式建立起来的农户有机农耕体系面临着庞大的城市消费群体,如此巨大的消费供给很难以小农户为主体来完成。而要将城市消费者的潜在需求变为现实供销结构,则需要政府或城市公益组织的介入。在郫县安龙村和登封归朴有机农园的案例中,成都和郑州的NGO组织在组织消费者方面都发挥了主导性作用。而在河北某大城市的周边,生态农耕农户在销售方面面临的突出困境是,该城市内公益组织严重缺乏,农户凭借其自身力量难以完成消费者网络的联系和组织工作。在郫县安龙村,生态农耕户建沼气设备所需费用的50%是由当地政府和公益组织援助的,这为生态农耕的综合开发提供了先期固定资本投入。

二是半农半X的收入结构。此处的X指农户的非农耕活动。在我们调查的生态农耕户中呈现不同程度和方向的兼业状态。在郫县安龙村的6户生态农耕户中,除了高家以外的其他农户都从事有机农耕之外的其他经济活动。建筑工、电工等灵活性较强的差事所带来的收入大约占到了农户收入的一

半。而高家是6户中专业化最强的,其18亩地中的2/3都用于自身的生态蔬菜的种植,并且发展成了以农业为基础的兼业化。在邻村的生态农耕户中,基于生态农耕的市民接待、农家乐等活动也成为收入的重要来源。可以说,在基于农户的有机农耕的开始阶段,由于生产、销售经验的限制和消费者网络不够发达,非农收入成为农户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而随着生态农耕规模的扩大,基于生态农耕本身的服务业也成为农户收入的重要支撑。

三是农作物产量的变化与稳定。根据对全国90户有机农户的问卷调查,我们发现随着生态农业实施年份的变化,农户农产品产量水平呈U型曲线变化。

第一阶段,施行有机种植后总产量减少,以华北平原地区的保定为例,小麦每亩减产100~300斤(有部分农户报告产量变化不大,质量提高,价格提高)。汇报产量增加的农户的耕作年份一般为3年,这时生物肥已经取代了化肥,产生了更持久的效益。实施有机农业后,农产品减产主要发生在处于有机耕种初期的农户。有机耕种时间较长的农户,产量基本保持稳定。2012年开始用有机方法种植小麦的农户陈杏国、陈建奎报告说,第1年的小麦亩产下降超过了10%,但由于农药化肥的投入大规模下降,拉低了总成本,而粮食价格没有明显的变化。这样的首年下降数量,因种植作物不同、地区不同及劳动者的技能不同而不同,在南方水稻种植区,有农户报告说首年单产下降额达到了30%~40%。一份来自社区的实行生态农业的调查报告显示,当地的病虫害在实行有机种植后相对少了。2008年,周边地区爆发虫害,唯独实行有机种植的村庄稻田未受大的影响。

三、价值的回归与身份的捡拾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生态农耕是一种对农业一村社关系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回归,是农户对自身身份的捡拾、认知与认同,是对劳动自信的找寻与重建。

我们之所以要强调农业—农社关系的综合体而非简单地指说“农业”,原因在于,孤立地把农业作为一个与其他经济部门并列的部门,其言语本身,是一种割裂与剥离的判断。从一个更长的视角来检验的话,我们大致可以把现代性引进的过程与农村村社共同体解体的过程看做一体两面的过程,而所谓的共同体解体,其实是村社的价值、人际关系—文化

与经济活动(农耕)等组成部分的相互隔离,其中的价值与文化逐渐呈现出一种消散、异变和泯灭的状态,而农耕活动则表现为一种被日益现代性的国家体系所剥削、吸纳、改造的过程。如果把传统农业视为一种价值—文化(人际交往)—农耕的统一体的话,现代化中的农耕则日益成为国家体系及国家体系所倚重的城市经济和工业经济的附庸,而农村劳动者在态度和行为上对农业的疏离,无非是这种附庸化在个体层面上的表现。学术界广为讨论的青年劳动者身份认同的游离,正是时代大图景中个体身份的“丢失”。

生态农耕对农村村社和农耕劳动者的身份重建与捡拾体现在很多有趣的、耐人寻味的细节中,这些细节由永济有机联合社中对社区农户加入生态农耕联合社的“入会须知”便可见一斑:

(1)户籍在本社区或长期居住在本社区(3年以上),并有自耕土地的农户方可加入;(2)家庭邻里都能和睦相处的农户,没有或者彻底改正以前偷盗赌博等不良嗜好的农户;(3)自愿参与社区的各项公共服务活动的农户;(4)爱惜土地,愿意以自家1~5亩土地做有机土壤转换并以土地参股合作社的农户;(5)要有精耕细作种庄稼的良好意识,需认真做好种养殖生产过程中的田间记录;(6)自费参加每季度和冬闲时的集中技术系统培训和交流;(7)只有具备以上条件方可联系合作社辅导员,填写入社申请表和家庭详细基本信息表。审核不通过者,辅导员需退回家庭信息表并转达不合格说明,也愿保持良好的社区互勉关系。

这份须知在指明了参加联合社的基本条件之后,又花了很大气力强调类似“邻里和睦”、“参加公共服务”之类似乎与农业生产关系不大的条目。用很多笔墨叙说诸如“爱惜土地”、“做好记录”这样在当代化肥农药式农业中已经绝少见到的要求。联系到广大农区中“打药施肥—外出一机械收割”的农业耕作方式,的确让人感慨。在这里,村社不再是春去冬回的旅馆式存在,而是在向相依相守的传统价值回归。土地,也不再是单纯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资料,而是需要勤恳细致对待的生存依托。而在回归勤恳、回归村社价值的过程中,一种劳动者的自信跃然其中。在此过程中,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找回同时发生着。

身份的找回与自信的重建也体现为对生态农耕价值的坚守,而这种坚守已经超越了对一般经济理性的容纳范畴。如果要实现可持续的、长期的生态

农耕过程,生产者要把对这一生产形式所内置的和赖以存在的原则置于短期的经济利益之上。

这里对有机农户自信及对土地与生产方式自信重建的强调,基本上是一种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视角的扩展。我们认为,熟练和富于创造性的生产能力的培养与自主的生活方式的建构,有赖于此种生产能力和生活方式的自信、预期和想象,因为后者决定了劳动者在一定方向上投入智力、体力,发挥其创造力,并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身心的满足。

四、“人力资本”的再生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村劳动力迁移比例迅速下降。相对于未迁移的农村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7.6年)而言,迁移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更高(8.9年)。约80%的迁移劳动者都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约有70%的迁移劳动者具有初中学历。换句话说,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多为学历较低、年龄较大的人群。

按一般的人力资本观点,留在农村的人群处于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但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些年事已高的农业劳动力相比于长期在外的新生代,有更丰富的农耕经验。如何让这些人的农耕知识和技能得到焕发,实现“人力资本”的再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而利用传统农耕知识的生态农耕为此提供了一种思路。根据此次调查,生态农耕农户中有近85%的人年龄在40岁以上,44%的人学历在小学及以下。传统农耕知识体系不同于现代知识体系,很大程度上依赖感性经验的积累。其习得的过程,可以通过基于社区人际交往的感知、模仿来掌握。而经验的积累和人际的熟稔,恰是这些学历水平低、年龄高的劳动力的优长之所在。

五、农产品的“益农”式交易

在商业资本与农户之间的不平衡地位中,农民一般只获得其产品利润中相对低比例的部分,而相当大部分的利润可能被中间商所占^[2]。通过表1可以明显看出目前我国蔬菜流通中利润在各流通主体间分配不均衡的现象。与农民相比,批发商的成本利润率要高出6~10倍,零售商的成本利润率高出5~7倍,而农民的利润既要受到季节、气候、供求、生产资料、生产技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又最不稳定。批发环节和零售环节的价格波动很有限,利润空间相对稳定。^[3]换句话说,受不确定因素影响最大的农户在整个农产品销售中获利远低于中间商

表1 蔬菜交易三个环节利润分配比例

菜源	生产环节			批发环节			零售环节		
	成本	绝对利润	成本利润率	成本	绝对利润	成本利润率	成本	绝对利润	成本利润率
大连蔬菜	0.82	0.48	19.7%	1.724	0.276	192.9%	2.335	0.365	147.5%
寿光蔬菜	0.88	0.66	25%	2.228	0.272	156.4%	2.835	0.365	138.2%

和零售商,而后两者一般有更好的经济条件。借用扶贫领域的“益贫式增长”(这里主要指绝对对益贫式增长概念,即穷人获得的增长的绝对利益要等于或多于非穷人获得的增长的绝对利益)的概念^[4],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非“益农”式交易。

我们可以将这样的农产品销售视为财富的相对的“累退式”转移,即财富相对地由“不太富”的个体转移到“不太穷”的个体。或者说,财富的增长率与风险的承担程度成反比,财富的增长率与经济实力成反比。根据达尔顿准则,如果一个收入分配是由一个分配经过一系列的累退性转移得到的,那么前者一定比后者的不平等程度要高,如新旧洛伦兹曲线所反映的。

而在以“公平贸易”为理论基础、采用“参与式定价”的城乡农产品直销中,中间商和零售商环节被去除,生态农耕农户与城市消费者在考量有机农产品成本和风险的基础上,商议得出能被双方接受的价格。这样,社会财富就会由城市中产阶层直接向农户转移,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益农”式农产品交易。

六、生态农耕的外溢效应

随着生态农耕在社区更大范围内的推广,生态农耕试验带来的不仅是经济收益结构的改变,还带来了社区整体生产方式的转变,一种更持续和可循环的资源利用方式逐渐显现出来。

郫县安龙村实施生态农耕7年以来,在民间环境公益组织的推动下,由开始阶段的个别农户参加,到生态农耕方式的大范围推行,当地卫生状况、环境状况得到明显改善,粪便得到资源化处理和利用,污水处理后完全达到农灌水标准,被循环利用。截至2012年8月,2年间安龙村以村民为主体完成160户农村生态家园建设,生态效益显著:粪便资源化利用96吨,尿液资源化利用383吨,节约用水11497.5吨,污水处理、循环利用22995吨。安龙村被国家环保部授予“国家级生态村”称号。2010

年,成都市观鸟协会在这里发现32种鸟类,近百只珍稀黄缘蚱在此翩翩起舞。通过发展生态农耕、有机农业,提高了村民收入,并通过搭建平台、组建绿色消费者联盟,购买村民生态农产品,促进城乡互助交流,共同参与环境保护。目前安龙村周边生态农耕地面积共80多亩,有绿色消费者600余户。

生态型都市农业具有净、美、绿的特色,有利于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存环境;它还是一种开放型、多样化的农业,它将现代农业技术与传统农业技术实现有机结合,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密切配合,区域开发与小流域治理高度统一,生态保护与建设和环境治理与管理相提并论,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相互融合,从而实现了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高度统一和可持续发展。^[5]

此外,生态农耕更加强调城乡之间的参与式认证和公平贸易,它以“市民下乡、农业进城”理论为指引,积极推动生产者与消费者、农民与市民、农村与城市的大联合,从而发展出了不同形式的城乡互助模式。^[6]

[参 考 文 献]

- [1] 杜鹰. 现阶段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基本特征与宏观背景分析[C]//中国转就时期劳动力流动.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 [2] 黄宗智. 小农户与大商业资本的不平等交易:中国现代农业的特色[J]. 开放时代,2009(2):90.
- [3] 孙侠,张闯. 我国农产品流通的成本构成与利益分配——基于大连蔬菜流通的案例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2008(2):39.
- [4] 周华. 益贫式增长的定义、度量与策略研究——文献回顾[J]. 管理世界,2008(4):167.
- [5] 石嫣,程存旺,雷鹏,等. 生态型都市农业发展与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兴起相关性分析[J]. 贵州社会科学,2011(2):56.
- [6] 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 社区支持有机农业——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发展生态农业十年探索[R].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2011.